



大唐之美:开放 融合 浪漫 精工



摘自《大唐之美》，齐东方、陈诗宇、石钊钊、王南、秦大树、汪珂欣、陈秋荣、邵彦、史睿、常青、徐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1月出版。

一言论,对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来说是很大的刺激,他们从1932年开始在中华大地上遍寻古老的木构建筑,到1937年6月底之前,业已发现一大批宋、辽、金时期的珍贵遗构,独缺唐代木构遗存。但他们始终抱着“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最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在五台山佛光寺找到了当时所知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终于得以圆梦。这一发现,在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的学术生涯中,绝对是一个伟大的高光时刻!

唐代绘画之美

今天面对的最大困境是这些名家大师的原作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存世的唐代卷轴画基本上都是摹本,或者是他们风格传派的作品。必须承认,曾经处于绘画史中心的卷轴画在五代之后的中国绘画史中才有大量作品存世,它们的可靠性也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提升的。五代以前的绘画实物以考古发现的其他媒材画种为主。综合起来看,认识唐代绘画需要从以下几类材料入手:

地上文物遗存是了解唐代绘画最重要的材料来源,这一部分包含石窟寺壁画、寺观壁画以及部分石刻线画;另外则是敦煌吐鲁番石窟壁画和纸绢麻布画,虽然出于地面,但因封存已久才被发现,也称为出土文物。虽然纸绢麻布画部分是从墓葬里面发现的,并且既有手绘也有印刷形式,但是对了解唐代绘画来说,仍需将其归为地上考古。地上文物中还有一批特殊的珍宝:日本奈良正仓院的藏品,因一直被精心管理、修缮、维护,得以帮助我们重新认知唐代丝绸之路的文化样貌。因此,了解唐代绘画,认知并了解日本正仓院的唐代藏品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地下考古发掘多年来不断有重大发现,主要是墓葬美术、包括墓葬壁画以及一些画像石、石刻线画,不断推动着我们对唐代绘画的深入认识。相对地上文物来说,地下考古的时间、空间和社会阶层、用途等属性更加清晰、可靠,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做调查、整理与研究。

水下考古在近几十年异军突起。水下沉船上发现的外销瓷器上大量保留了另一种介质的绘画——瓷画。当然,瓷画也存在于出土发掘与传世藏品。因此,我们可以把传世品、地下考古、水下考古的发现结合起来看唐代瓷画。

唐代书法之美

建立唐朝之后,李家先认赵郡李氏,后又改认陇西李氏,还追溯先秦老子为远祖,但是必须拿出土族的本领才能成为百姓钦仰的天下共主。东晋南朝三百年开出了灿烂的文化之花,北朝帝王亦步亦趋才能维持王朝,笼络士族。隋朝虽然武力统一了天下,但完成实质的文化统一则道路漫长,隋炀帝倾心江南文化正是为此努力,但夭折中途。唐太宗李世民远学梁武帝,近仿隋炀帝,垄断了王羲之的全部作品。唐太宗深深理解《兰亭集序》成为天下法书第一的主观观价值:东晋流传至唐代的王羲之行书作品中卓然成篇者



莫高窟217窟《观无量寿经变》净土说法场景(局部)

极少,《兰亭集序》是王羲之最具代表性的不朽神作,具有文学、行动和书法上三重不朽价值,体现了他开创的行书体式最高成就,模仿这件作品,能够助力唐太宗继承中古士族的书法神性。李唐以老子为祖先,尊道教为国教,而《兰亭集序》倾注了作者王羲之的道教信仰,唐太宗选定此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以《兰亭集序》临摹为核心,唐太宗积极学习王书,向群臣及全国百姓展示自己是王羲之书法的最高传人,以压制士族,塑造自己文武双全、南北兼长的帝王形象。敦煌藏经洞出土唐太宗《温泉铭》拓本证明他的文化策略确实起到了实际作用,已经将学习王羲之行书的成就展示到大庭广众。

唐代丝路之美

唐朝以前,还有一条“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是从长安出发,经过灵州(今宁夏吴忠)往北走,穿过内外蒙古之间的大漠戈壁,一路往北到达漠北草原的核心地带(今蒙古国中部,鄂尔浑河流域),接着继续往西走,到达北庭(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在这里可以和丝绸之路北道会合,然后一路向西行。草原丝绸之路长期以来不被人重视,因为在唐朝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确实不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路,但是在丝绸之路的主线阻断的时候,草原丝绸之路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比如,有外国高僧从这条路线到达北齐。如健陀罗国高僧那崛多,由于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开始禁止佛教,因此他打算经突厥汗国回国。抵达漠北后,他应佗钵可汗的请求,留在突厥地区十余年,在那里传播佛教。这时,北齐僧人宝暹等十一人于北齐武平六年(575)从印度取经回来,携“梵经二百六十部”到达突厥。之后由于听说北周灭北齐并毁坏佛法,所以决定暂留突厥,并和那崛多一起,对他们带回的佛经进行了编目工作。他们到隋灭北周、佛法再兴时,才于隋朝开皇元年(581)回国。可见,如果丝绸之路是畅通的,僧人们就可以从今新疆过来,但是丝绸之路阻断了,僧人们只能从突厥可汗的汗庭,再南下到达现在的河北、山西,也就是北齐的核心地区。

抗战漫画里的民族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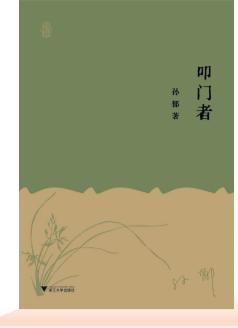
李钊

团结御敌的生动缩影。而叶浅予、华君武、廖冰兄、丁聪、张仃等杰出漫画家,他们如同手持利刃的战士,用画笔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揭露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时代心声,让漫画成为抗战时期最普遍、最有力的宣传工具之一。而在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漫画战士们以根据地为依托,用漫画为武器转战山区,与敌伪宣传队伍在一面面墙壁、一张张报纸上展开激烈争夺,打响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漫画战”。他们用漫画宣传的方式,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与精神熏陶,使抗战漫画成为救亡的工具、杀敌的刀枪,为中国人民注入抗敌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日本法西斯在投降书上签字,14年的不屈岁月里,漫画家们以尖锐的笔触和生动的形象,在浸染着烽火味道的抗战漫画作品中,铭刻下一段充满血泪的深沉记忆,绘就出一幅幅气壮山河的时代画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速侵华步伐,犯下了累累战争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伤害。战火纷飞中,丁聪绘制出《战争的牺牲者是人民》,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战争的残酷和无情。面对种种不利形势,中国人民凝聚力量,团结一

心,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从“一盘散沙”到全民族抗战的奇迹。漫画家张乐平绘制的《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反映出中国民众已初步形成不屈的抗战意识和抵抗力量。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军人以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正面和敌后战场开展着广泛和长期的军事抵抗,给予侵略者有力的打击,使日本侵略者日趋失去战争主导权。如蔡若虹在漫画作品《全民抗战的巨浪》中描绘日本被中国“全民抗战”的巨浪所吞没,遭受灭顶之灾,画作背后所反映的正是抗日军民迎接光明到来的坚定决心。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举行,标志着中国战区对日作战的全面胜利。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伟大复兴之路。这一无数仁人志士用生命和鲜血赢得的胜利时刻,被印刻入漫画《历经八年血与火,百年耻辱一朝雪》,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

如今,战争硝烟已经消散,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神州大地繁花似锦,但当我们再次审视这些铭刻民族记忆的漫画杰作时,他们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剑,时刻提醒我们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用不懈的奋斗、强劲的实力来捍卫和平的果实。



《叩门者》,孙郁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孙郁是资深的鲁迅研究专家,他深耕研界数十年,出版著作《鲁迅与国学》,通过梳理鲁迅手稿与资料,全面剖析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孙郁在旧纸故闻里浸淫日久,深隐的才情从笔下流泻而出,其中的简约、精致、清明、平和,颇得苦雨老人的散淡之风。他虽身处象牙塔之中,却更具诗人气质,倒像民国的读书人,诗中隐含着清醒的理性,因此,他的笔下自是另一番景致,恬淡、自在、流丽,而又收放自如,读起来不那么艰深晦涩,不那么学术,而是像说话一样,惹人喜爱。

《叩门者》是作者退居郊区、享受退休生活的2020年至2023年四年间所写随笔的最新结集。本书收录了数十篇围绕文学、文化、历史与人物的相关文字,内容包含了文学与思想探讨、文化与历史钩沉、人物剪影与怀念等多个维度。作者以娓娓道来与读者促膝而谈的语调,挖掘出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文化细节和边缘存在,回望过往的人事,分析他们的心理和文化,看历史车轮在个体生命里碾轧过的轨迹,从不同的人生里得到了诸多的时代和生命的体味。

孙郁说:“关心文学上的故旧,不能不留心民国以来报刊上的文章,那里总有一些意外的文本在。这些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字,已经多了起来。人们如此热衷回望前人,说不定也是有寄托在的。”作者也是有所寄托的,他在意的是那些得之于野的精神体验。具体到本书,作者论及的前人就有鲁迅、木心、孙犁、汪曾祺等,作者在往事细节的追寻和叙事里,使读者得以从先贤的行迹里感受往日遗风。

如作者借读段华的《孙犁年谱》,谈说了自己对孙犁的认识和评价。读者之所以愿意而且喜欢读孙犁,“是因为那文字里有一股逆时而上的清风”,这是文坛最为难得的东西。抗战时期,孙犁没有躲进书斋,而是去了前线,以笔为枪,参与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图名利,做编辑编报刊,培植了许多青年;当八股文笼罩文坛时,他又与之勇敢对峙,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维护了文坛的清风正气。孙犁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他坦言缺点,承认失败,不以流俗尺子衡量是非,平常中有非凡的情思在。他既与时髦理论保持距离,又不忘乡土社会的风致”,他的文字“体现出他内心的清洁”。孙犁的文字,牵动着现当代文学史诸多的神经,包括那些未被其写到的旧事,也有着不小的史学价值。

对于年谱的写作,孙郁自有其独特的体验,我想,这与他多年研究鲁迅、撰著有关鲁迅的书籍有关。他说:“作家的年谱隐含着诗文本事,是人文地图的一种。前辈治学,强调从人物年谱入手,这样才能够避免空泛之论。但沉浸于此,用心用力者不多。年谱写作,不适合集体来作。许多人物年谱,集体写的都没有个人写的好,原因是质量不平衡,如果是项目制,那就更难保证质量了。段华写孙犁的年谱,是精神需求,非一般功利之心使然。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耕耘很深,思考亦勤。”从上小学起,段华就追随孙犁,他积三十年的时光,倾尽心血写作《孙犁年谱》,自是有寄托在的。孙犁先生虽然远去,但后人瞭望其背影,他的文字和品格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文字看似平淡,其实含有深意,清澈中也有波纹闪动,道道涟漪,能传递到看不见的远处”。

孙郁的说话,大多是借谈书而说人。在《旧信重读》中,他深情回忆了与邵燕祥的交往,也对邵燕祥的写作和个性有精彩的叙述。在孙郁眼中,邵燕祥更像江南文人,沉静而内敛,谈天说地,不紧不慢,是没有油滑调子的北京话。他聪慧,阅读面广,晚年的笔记大有古风,每每不忘情于历史暗影与人间百态,反讽的文字带有锋芒。所以在孙郁读来,邵燕祥的文字有一种沧桑感,左翼的痕迹与京派的遗风都有。邵燕祥那一代人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在他们的文字里都有所表达,我们后人读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字的力量,更多的是一代文人对时代的表达,对人性的拷问。

孙郁说书忆事怀人,不是泛泛而论,而是带着自己的情感和认知,带着对历史的回望,在回望里,打量文化,让文化的因子和文人的风雅在一代代文人中流传。比如鲁迅,他是那个时代的冠绝群伦的人,以超人间的人间性,审世态之冷暖,辨阴晴之幻境,点染出国民性的本然。他又借得域外之火,驱冷风于绝境,得快意于怀中,不仅拓出辞章新径,也改写了中国思想脉络。所以,后世仰望者众。

在孙郁看来,真正的写作并不是占有什么,自己以为掌握了真理,而是克服什么,让自己知道自己的限度在哪里。这就是人们何以要思考、要写作,因为通过思考和写作,通过这一次次叩门的过程,从过往和已知出发,才能去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去不断解惑、不断提升,不断做一个真正的安安静静做事的文人,而不是跟风、起哄、炒作。

胡忠伟

叩响文化之门 瞭望文人风雅